

外国文学函授教材

第七期

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北京·1985

外国文学函授教材 · 第七期目录

1. 外国文学史

第六编 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续）

- 第四章 十六世纪德国文学 高申甫 (1)
第五章 十六世纪西班牙文学 许 锋 (8)

2. 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

- 日本新思潮派简析 刘春英 (18)

3. 外国文论选讲

- 叔本华意志主义美学简述 斯希平 (22)

4. 外国文学名著选评

- 《卡拉马佐夫兄弟》简析 冯增义 (30)

5. 外国文学翻译辅导

- 漫谈外国文学翻译 磊 然 (34)

6. 外国美术知识

- 第七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 李 春 (38)

7. 外国戏剧知识

- 能——日本古典歌舞剧 申 非 (46)

8. 当代外国文学资料

- 社会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之异同 谢胜建译 (51)

- 现象学的文学理论 张金言 (55)

- 当代美国文学的银色时代 陈建华译 (61)

- 近年来西德文学简况 宁 瑛编译 (67)

- 今日意大利文坛概况 袁华清 (69)

- 法国历史小说方兴未艾 周丽君编译 (74)

主办：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第六篇 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续）

第四章 十六世纪德国文学

高中甫

第一节 概述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在德国大体上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政治上的分裂和封建诸侯的割据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也造成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法国、意大利、英国相比，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较晚，从经济结构上看，十六世纪初的德国，依然是一个封建国家。在农村，农民遇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十三、十四世纪已成了自由人的农民，这时封建主义力图把他们变成依附农、农奴。领主可以任意蹂躏农民及其妻女；在城市，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保持着主宰地位。尽管如此，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一些地区，在某些领域里有了迅速的发展，象沿海城市的贸易，工业中的采矿、冶炼、纺织、印刷，白银的产量已居欧洲之首。

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并也必然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上层建筑里得到反映。作为这个世纪德国文化和精神生活上的重要标志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三者对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规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德国的文艺复兴比意大利要晚，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由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和活版印刷的发明（古腾伯格在1446年），它才在一个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了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称为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在文化和思想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没有取得象在意大利的那样巨大的成就和影响，但是它的成绩是不容低估的。正是由于文艺复兴和随之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才结束了中世纪封建文化的宗教性质，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从狭义上看，它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标志，因为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世俗的性质，世界的中心，人的精神内容不再是神，而是人本身。它要把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对禁欲主义和僧侣的伪善，充分肯定现世的生活和人的价值和意义。这实质上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新兴的、尚处萌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的要求。

人文主义产生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德国较晚，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德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学者

多半是自然科学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小，特别是对文学的影响也有限。到十五世纪末，第二代人文主义学者出现了，其中最孚众望的有洛依希林、埃拉斯穆斯、胡腾等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著作，如魏姆费林、洛依希林、洛赫尔的戏剧，《蒙昧者书简》、埃拉斯穆斯的《愚蠢颂》、胡腾的富有煽动性和战斗性的短诗和对话，都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为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先导，起了推动的作用。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的活动还仅限于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范围里，他们为一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思想上做了准备，而形成德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却是由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在人文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于1517年10月30日在维腾堡教堂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成了声讨罗马天主教和教皇的战斗檄文。恩格斯写道：“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大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①市民阶层、农民骑士，甚至部分诸侯和一切在天主教压迫下的人都把路德的这一勇敢行动看做是反对天主教奴役的信号。

德国的宗教改革的性质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表达了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用宗教语言提出的要求。路德是这一运动的发难者。他在1520年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关于基督教自由》和《教会的巴比伦囚徒》）中宣布了自己的宗教纲领和政治纲领，宣称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否认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无上权威，认为人只有依据《圣经》的信仰才能解救自己，号召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

路德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也是位伟大的语言学者和文体家。他翻译的《圣经》既忠实又生动形象，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他在翻译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和语法结

构，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②从此，不仅新教的唱诗和说教，就是一般的诗歌和戏剧也都使用路德的语言。

除了语言上的成就之外，路德还根据《圣经》翻译、改写和自己创作了一些圣歌和赞美诗。他在进行这类创作活动时遵循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应该避免时尚的和宫廷的表达方式，选择简单易懂，可吟唱和有民风的表达方式，内容必须表达清楚明了，忠实地再现赞美诗的原意，但诗人不需奴隶般地拘泥原字原句。路德在1524年、1529年、1542年出版的歌集中，分别有他翻译、改写和创作的歌曲共有四十一首。它们都体现了他的上述主张。在路德自己创作的诗歌中，其中最有名的是《我们的主是坚固的堡垒》，海涅把它称做是“宗教改革的马赛曲”。

除了宗教歌曲之外，路德还翻译了伊索的一些寓言，并在每则寓言的结尾处，自己撰写了“教训”，来宣扬自己的宗教主张和道德原则。

路德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所发难的宗教改革运动却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战争的先导，这场农民战争是宗教改革更广泛更深入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路德的宗教纲领和政治纲领成了农民反对天主教和贵族的武器，然而，当农民发起了这场反对教会反对贵族的战争时，路德便转而反对农民，恶毒地对农民加以咒骂。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坚定的领袖，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

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热心拥护者，曾在莱比锡与路德会面。但他不满足路德的宗教主张，他不仅

^① 《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版，第38页。

^②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6页。

对宗教而且对国家也进行猛烈的抨击，要求实现一个摆脱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力的新世界，人不应在来世而应当在现世中去寻求天国。在地球上建立起的这样一个天国应该不再有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他热情地进行鼓动宣传，并在1525年上半年创办了一种共产主义公社。他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农民战争，失败后被捕牺牲。

闵采尔是一个革命的神学家，是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领袖。为了鼓动宣传，他先后写了不少充满战斗激情的说教词、号召书，如《致阿尔史塔特人号召书》、《致曼斯费尔特伯爵书》等。这些小册子不单是一般的号召书和布道词，而是德国历史上最早的革命宣传文学。

这场伟大的农民战争不幸失败了。在当时文学中，除了少数民歌之外，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反映。然而它在此后的德国文学中，成了许多著名作家所采用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德国政治上陷入更深的分裂，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到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宗教改革的潮流，在德国内部，在路德教派的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人文主义者也为这次农民战争的失败付出了代价，他们的活动局限在古代文化遗产的维护和保存，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大学和拉丁语学校。

文学也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直到十六世纪末，德国没有出现特别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作家。在这个时期，除了一些寓言、笑话、动物故事之外，值得提出的就是汉斯·萨克斯的诗歌和戏剧，约翰·费沙尔特的讽刺小说以及在德国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的“民间故事书”。

十六世纪的德国没有产生如同一时期邻国那样一些著名的作家，如莎士比亚、拉伯雷、阿里奥斯托等，但是这是一个战斗和革命的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农民战争不仅在德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重要

的地位。

第二节 人文主义作家

1. 约翰·洛依希林(1455—1522)

洛依希林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者，通晓希腊文和拉丁文，对希伯莱文尤有艰深的研究。在十六世纪初，在洛依希林与心胸狭隘的经院派神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1509年，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普法费尔克伦呼吁焚烧犹太典籍。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依洛希林和一些学者的抗议。普法费尔克伦在1511年写了一篇文章《手鉴》为自己辩护并对洛依希林进行攻击。洛依希林为此写了一篇题为《眼鉴》作为回答。由此他招致了科伦大学的神学教授和教会的围攻，他们企图将他送上宗教法庭。对洛依希林的威胁意味着人文主义面临的巨大的危险，如果他被判为异教徒，那此后的任何新思想都会以不同的借口被判为异端。于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表了支持洛依希林的书信。1514年洛依希林把这些书信、声明汇集成册，冠以《著名人士书简》加以出版，在1519年又出版了续篇《知名人士书简》。洛依希林的支持者在1515和1517年又分别编纂出版了上下两部《蒙昧者书简》。上部的主要作者是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下部的主要作者是乌尔利希·封·胡腾。两部书的作者以不学无术的蒙昧者的口吻，装做是经院神学家或教士的身份，用拙劣而夸张的文风给洛依希林的攻击者、科伦神学家奥·格拉齐乌斯写信。表面上是控告人文主义者对神的种种不敬和亵渎，实际上是对中世纪神学和宗教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抨击。例如，一个人想当教士，他爱上了一个女人，害了不治的相思病。于是他写信向格拉齐乌斯求教，因为格拉齐乌斯说过，他写有一本可以博取任何女人欢心的小册子。

洛依希林不仅是一个有很高造诣的语言学者，他在1496和1497年还分别用拉丁文写

了喜剧《塞尔求斯或者笨蛋》和《排戏或者汉诺》。在前一部作品里他鞭挞了僧侣的愚昧，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后者是一部类似法兰西闹剧的作品，它讽刺了法官的昏庸，这部戏给作者带来了声誉，成为人文主义戏剧的典范。

2. 埃拉斯慕斯·封·鹿特丹（1466—1536）

埃拉斯慕斯·封·鹿特丹是欧洲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出生于鹿特丹，是一个牧师和医生女儿的非婚生子。他是一个荷兰人，但他的活动和著作对德国的影响甚大。他于1509年用拉丁文写就的《愚蠢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这部作品里有一个名为“愚蠢”的女人，她在台上发表演说，竭力夸耀自己的愚蠢，声称，如果所有人的思想、行为、要求，不归结于愚蠢，不是以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傲慢虚荣、沽名钓誉的面目出现，那这个世界就根本不存在。作者在作品里对教皇、牧师的愚昧无知、堕落腐化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对封建领主的恶狠好斗加以猛烈的抨击。

《愚蠢颂》这部作品由于对真理的热爱、对生活观察的深刻、富有形象感以及犀利的讽刺和会心的幽默而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给作者带来了声誉。埃拉斯慕斯除了这部《愚蠢颂》以外，还写有《亲切的谈话》（1519）。

埃拉斯慕斯的作品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他的性格和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他私心重，追名逐利。在《蒙昧者书简》中，他的同时代人就说过：

“埃拉斯慕斯是一个为己的人。”他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采取拒绝的态度；当胡腾参加骑士起义失败后前往瑞士投奔他时，他拒绝接纳。他的这些行为受到同时代人的批评。

3. 乌尔利希·封·胡腾（1488—1523）

胡腾是德国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中

最热情最富有革命精神的战斗者。他生于富尔达的一个没落的骑士之家，曾在科伦、爱尔福特、莱比锡等地的大学学习。1515—1527年他先后去意大利，在罗马、波罗尼亚攻读法学。返国后进行反对教皇的活动。他认为教皇是德国一切灾难的根源。1521年他参加了骑士济金根领导的骑士起义，失败后逃到瑞士，受到瑞士人文主义学者茨温格利的保护，不久即客死苏黎士湖上的一个小岛。

胡腾是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活动和斗争都是为了德意志祖国的自由和解放。他用这样的话来表明他的志向：“我为之战斗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为了统治，我奋斗的目的是为了把被强力剥夺掉的自由还给祖国。……我想到的总是自由，我衷心渴望是及时地为祖国服务。”

胡腾的文学活动是他进行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的组成部分。《蒙昧者书简》下部大都是由他撰写的。

胡腾还写过多篇讲话、对话体的文章以及一些诗歌。在这些作品里，胡腾以一个革命政论家的姿态，抨击了宗教、领主、贵族们的残忍、野蛮。在题为《法拉利斯主义》^①的对话里，胡腾让希腊神话中的使者麦尔库尔把镇压“穷苦康拉德”起义的刽子手威腾堡公爵领入地狱。在那里他遇到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如梯伯留斯、卡利古拉、尼禄等人会面，并向他们求教。

胡腾的语言准确有力，通俗易懂，力求形象具体，他把“诚实，不务浮华”作为自己写作的信条。他用拉丁文和德文写的著作在民间流传很广。

4. 塞巴斯蒂安·勃朗特（1457—1521）

1494年在巴塞尔出版了一部题为《愚人船》的讽刺作品，这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作

^① 法拉利斯，公元前六世纪西西里的暴君，以施酷刑为乐。

品之一，它的作者是人文主义作家勃朗特。

勃朗特出身市民阶层，在巴塞尔大学攻读法律，后来成为该校的法律教授。1500年他返回故乡斯特拉斯堡，成为高级官员。他深受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赏识，被授予皇家顾问的职务和法尔茨伯爵的头衔。

勃朗特的政治态度和宗教观点是保守的，他墨守经院学派的陈规陋习，对科学和进步持怀疑态度，对同时代接近人民的文学保持距离。然而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却与他的这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主要作品《愚人船》是一部对时代的批评和讽刺的总集。在一艘船上乘有一百一十个愚人，他们分别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各式各样的蠢行的化身。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恶德和丑行，诸如卖官鬻爵，谄媚求宠，荒淫好色，贪婪欺诈，嫉妒，粗鲁等进行了嘲笑和鞭挞。

这部作品由于其尖锐的讽刺和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而受到广大读者和人文主义作家的欢迎。有人称赞它是“神的讽刺”^①，胡腾认为《愚人船》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第三节 市民阶级的文学代表

1. 汉斯·萨克斯（1494—1576）

汉斯·萨克斯是德国十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他出身平民，生于纽伦堡，父亲是一个裁缝。十五岁时他就成了一个制鞋徒工。他没有进过大学，他的知识和才能不是得自于大学的教育——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他是一个没有受到教育的人，既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希腊文，而是得自多年的漫游。他的足迹遍及德国，也到过意大利和法国。在漫游中，这位未来的诗人获得丰富的知识，认识了世界和人生，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他的第一首诗歌是他1514年漫游途中于慕尼黑写就的，时年十八岁。到他八十二岁逝世时，他一生完成的作品的数量是惊人

的。诗人在1567年对自己一生的创作做了一个总结：共有4275首工匠诗歌，1700部对韵体作品（其中包括二百个剧本），73首民歌形式的宗教和世俗诗歌，七篇散文对话。他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流传下来，有的剧作直到今天仍不时出现在舞台上。

汉斯·萨克斯出生在宗教改革的年代，受到路德的影响。青年时期的萨克斯充满了战斗的热情，当他漫游归来时，于1523年写了一首颂扬路德的长诗《维腾堡的夜莺》。维腾堡是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地方，萨克斯把路德喻为夜莺，它的歌声将把群羊（喻为基督教徒）从黑暗中领到牧人（喻为天主）那里。除了这首传诵一时的诗作之外，他还写了几首对话体的散文，宣扬宗教改革。1527年诗人应一个路德派牧师之请为一些在纽伦堡的议会图书馆和一些修道院找到的古老图画配诗。这些诗歌对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为此受到了市议会的警告。他屈服于市议会的规定，成了一个“守法”的路德派教徒。他的妥协不仅是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也与他的阶级地位有关。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还处于居主宰地位的行会的领导之下，他是这个阶层的诗人，这是他的长处，但也表明了他的局限性。他拥护路德的宗教改革，反对农民起义；他批评社会的种种丑行，但他的批评却是以行会性质的市民阶级的道德为标准。他把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归之于社会所有阶级所共有的恶德：自私自利。他渴望变革，但满足于眼前的平静生活，他有着投身时代事件中的要求，但一遇到压力便把目光转向过去和身边的琐细生活。萨克斯身上的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德国行会性质的市民阶层的弱点。

萨克斯的作品主要是工匠诗歌和戏剧。工匠诗歌起源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

^① 此处把《愚人船》与但丁的《神的喜剧》（即《神曲》）相比。

时，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兴起和经常进行歌唱比赛，这种体裁的诗歌有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城市还为比赛而建立了“歌曲学校”。萨克斯漫游归来就在纽伦堡建立了这样一座学校。他创作的工匠歌曲标志着工匠诗歌所达到的高峰，在他之后这种诗歌就走上了坡路。萨克斯的戏剧有谢肉祭剧以及悲剧喜剧等。谢肉祭剧是一种非宗教性质的戏剧，它的题材都是世俗内容，与民间故事、笑话和愚人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傲慢的贵族，狂妄的教士，寡廉鲜耻的托钵僧，狡猾的商人，没落的骑士，贪心的农民，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流弊和痼疾，都成了他作品中讽刺和嘲弄的对象。他的戏剧则与谢肉祭剧不同，大半取材于历史、《圣经》、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民间故事等。有的批评家称，萨克斯的这类创作本质上是再创作。

萨克斯的作品是他所处时代的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它们的内容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谐谑的，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达了这个阶级的心声和对时代的要求。

萨克斯的创作标志着这个时代文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他对同时代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许多工匠歌手都自称是他的学生。到十七世纪时，由于工匠诗歌和谢肉祭剧的没落，他遭到了冷落。到十八世纪时，他的名字再度放出光彩，他的价值被人们所承认和肯定。歌德在《汉斯·萨克斯的诗歌使命》一诗中称他是“真正杰出的诗人”，理查·华格纳用歌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2. 约翰·费沙尔特（1546或47—1590）

费沙尔特是这个时代战斗性最强的讽刺作家。他出生于斯特拉斯堡一个香料商人之家。在巴塞尔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成为律师，后担任公职，成为行政长官。

费沙尔特先是路德派教徒，他反对这时出现的一股反宗教改革的潮流，但他也不满日益变得保守的路德教派，于是转向信奉加

尔文教。他的这种宗教观点就确定了他的作品的一个主要内容：一方面把他的矛头指向天主教和其僧侣，另一方面用加尔文教义的精神来进行说教，批评人世间的种种恶德，赞美劳动、勤奋，他宣称劳动是通向德行之路。

费沙尔特的主要作品有《苏黎士的幸福船》（1576）和《耶稣教士的四角小帽》（1580）。前者是一首长诗，内容是写斯特拉斯堡人邀请苏黎士人参加他们举行的射击节。五十四个苏黎士人划一艘船在一天之内就到达了斯特拉斯堡。作者充满了市民阶级的骄傲，用质朴的语言，通过这一真实感人的事件，表达了对有民主思想的苏黎士人的同情，赞颂两个自由城市的团结。后者是一部讽刺作品，把他犀利的笔锋指向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耶稣教团。从前魔鬼为了掩盖头上的角，给同伴戴上有角的帽子。如今，魔鬼把一只角的帽子给僧侣，二只角的给主教，三只角的给教皇，四只角的给耶稣教士。这部作品虽然在艺术上没有达到什么高度，但是它在当时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费沙尔特是那个时代具有自己特色的作家，这还表现在他把拉伯雷的《巨人传》从法文自由地译成德文。他针对德国社会的现实，添加进许多他自己的东西。

第四节 民间故事书

在十六世纪德国文学中虽然没有产生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但这却是一个民间文学的繁荣时代，出现了众多的民间故事书。这是与市民阶级对文化和娱乐的要求密切相关的。希腊传说、法国的叙事诗、意大利的故事以及德国中世纪的叙事诗和笑话集为德国的民间故事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有益的作用。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它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些故事书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读物，他们不仅从中得到了娱乐消遣，同时也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恩格斯在谈及民间故事书时，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培

养他们的道德感情，使他们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们的勇气，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①

在十五世纪已相继有一些民间故事书出现了，但十六世纪却是民间故事的繁荣时代。从这个世纪初起相继出版了一些深受民众喜爱并产生影响的民间故事书，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是《梯尔·欧伦斯皮格尔》、《席尔德市民》、《浮士德》等。

《欧伦斯皮格尔》的最早版本出现在1515年，全书共有九十五个故事。它把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故事都附会在一个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年青农夫欧伦斯皮格尔身上。他到处流浪，到处恶作剧，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加以捉弄调侃，教皇、国王、牧师、学者、商人、市民、农民无不在他的面前出乖露丑。他是人民的智慧化身，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良现象的愤懑，曲折地反映出了人们对变革的要求。另一部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席尔德市民》（1598）的第一版原题为《腊莱故事书》（1597）是一部内容生动、语言幽默的作品。它与《欧伦斯皮格尔》不同，描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故事中的席尔德市民自作聪明地干了许多蠢事，诸如建造没有窗户的房屋，捕捉阳光，播种食盐等。这些令人解颐的故事一方面满足了市民阶级的娱乐要求，同时也是市民阶级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的心理写照。

恩格斯对这部《席尔德市民》有很高的评价。他写道：“这种机智、这种构思以及写出的自然天成，这种善意的幽默到处伴着尖刻的讽刺使它不过于凶狠，这种异想天开的滑稽情况，这真能使我们文学里的一大部感到惭愧。”^②

如果说《欧伦斯皮格尔》、《席尔德市民》的内容偏重于戏谑，那么关于浮士德的民间故事书则有了一个严肃的、某种程度上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

浮士德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从流传下来的材料可以知道，他以魔术师、预言家、炼金术士、星相学家的身份在各地漫游。1540年，他遇盗被杀。后来围绕这个人物产生了许多故事和传说，也把诸如与魔鬼订约的传闻附会到他的身上。到1570年有人开始记载他的故事，1575年出版了用拉丁文写的浮士德故事。到158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最完整的版本《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全书共69章。

故事中的浮士德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学神学，学识渊博。他走火入魔，与魔鬼订约，魔鬼为他服务二十四年，他则必须放弃基督教信仰，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于是他借魔鬼之力，周游世界，通悉万有，享受到人们享受不到的一切，甚至从远古希腊招来美女海伦，与她一起生活。期满后他暴尸户外，灵魂为魔鬼所有。

浮士德的故事本来在民间流传，但是这个故事书的加工和修订者看来是一个路德派教徒。在书的告基督教读者的前言中，作者写道：“毫无疑问……魔术和黑色艺术对上帝和世界说来是最大最严重的罪愆。”作者把浮士德看成是一个异教徒，并以他的悲惨结局向一切怀有异端思想的人提出警告。然而浮士德故事本身表现出的反宗教的叛逆思想却远非这本故事书的编订者所能掩盖得了的。浮士德对宇宙和人生的富有冒险精神追求，对现世生活的肯定，使他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部民间故事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被译成英法荷等多种文字。随之，英国的剧作家马洛在1589年写出了《浮士德博士悲剧的故事》，德国的一些作家也相继以这个题材写出了自己的作品，而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歌德所写的诗剧《浮士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② 转引自《德国文学简史》上卷第48页，冯至等著。

第五章 十六世纪西班牙文学

许 铎

第一节 概 述

十六世纪，西班牙文学逐步走向全盛，放射出夺目的异彩。特别是那个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在西班牙空前高涨，涌现出诸如塞万提斯和洛贝·德·维加这样的文坛巨匠，把民族文学推上迄今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为此，西班牙文学史上将这一辉煌时期称作“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产生有其独特而复杂的背景。

西班牙于1492年最终战胜摩尔人实现民族统一之后，雄心勃勃地走向世界，发现了美洲，并用剑与火征服了那块富饶的大陆。1516年查理一世继位，建立起欧洲最早的纯粹君主专制政体。不久他又通过贿选，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改称查理五世，从而使西班牙的势力扩展到了德国、奥地利、尼德兰、意大利、瑞士、捷克和匈牙利，俨然成为欧洲与世界的霸主。

然而，这种令人炫目的兴盛仅如昙花一现，自十六世纪中叶起，那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便转向衰微。其原因显而易见。西班牙虽曾称霸一时，但它从不是欧洲一流的先进国家。“光复运动”绵延八百年之久，造成了十分有利于封建主义延续，而有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因此，西班牙统一之后，依然长久地在中世纪徘徊，没有象英、法等国那样进入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此后，专制王权的出现更阻断了西班牙社会向资本主义缓慢过渡的进程。这个王权与欧洲其它

大国的专制王权不同，并非“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而是“光复运动”的历史结果，本质上仍属于旧时代的产儿，其保守性甚至反动性远胜于它的进步性。马克思就曾认为它应当列入土耳其式的亚洲政体。在它统治下，旧的秩序被固定下来，“贵族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结果“不断衰落，苟延残喘”（马克思语）。美洲的征服以及殖民地的垄断贸易为西班牙带来巨大财富，并且曾一度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但是王室和贵族因为有了似乎取之不竭的美洲财源，对振兴本国经济毫无兴趣。结果从美洲滚滚而来的黄金在母国没有转变为资本，相反绝大部分流向了国外以换取进口工业品和奢侈品，而本国工商业面对外国资本的竞争得不到国家任何保护日益衰退。与此同时，查理五世和随后继位的菲利佩二世却好大喜功，妄想建立“泛基督教世界君主国”。对外穷兵黩武，拼命扩张，一再卷入与列强争霸的战争，耗尽了国力；对内则横征暴敛，血腥镇压，使得民不聊生，阶级斗争激化，终于内外交困，走入穷途末路。

西班牙的国运盛衰深刻地影响了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虽然一般地说，由于西班牙始终没有彻底摆脱中世纪状态，“中世纪的幽灵”仍然普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但是十六世纪初叶，当西班牙为“黄金国”和“世界君主国”的梦想所迷惑，放开门户走向世界之时，国内同时也出现了向整个欧洲文化认同的倾向。于是正在西欧各国兴起的

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回潮涌入了这个半岛国家，哺育了许多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埃拉斯穆斯学派的兴起便是明证。而后，随着君主国的衰落，宗教改革运动影响的增强，菲利佩二世变本加厉地对内进行反动统治。他利用宗教裁判所迫害异教徒和宗教改革派，镇压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查禁人文主义书籍，甚至实行“文化锁国”，不准西班牙人出国留学。这一系列政策无疑阻碍破坏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人文主义思想毕竟不可能被剿灭。特别是国势衰歇，封建制度腐朽的本质暴露无遗，引起一代仁人志士的反省思考。于是原本只限于一般倡导复兴古典文化和解放人性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日益高涨的社会批判浪潮汇合到一处，获得了更明确的反封建意义、更深厚的现实基础。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便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硕果累累的文学繁荣时期——“黄金时代”。

西班牙文艺复兴起自诗坛。早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潮的冲击，掀起了诗歌改革运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虽然不同诗派嬗替更迭，但是彼特拉克、维吉尔、贺拉斯的影响却经久不衰。

首先倡导诗歌改革的是一对诗友——胡安·博斯坎（1487？—1542）和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他们从意大利和古罗马诗人那里汲取营养，刻意模仿，创立了所谓意大利诗派。这个诗派采用意大利的十一音节诗体创作关于爱情、大自然和神话题材的抒情诗和寓言诗，并且一反十五世纪空洞造作的宫廷诗风，提倡淳朴、优雅、自然。与博斯坎相比，加西拉索的才气学识更胜几筹，因而成就也更大。他被誉为“西班牙的彼特拉克”，是当时宫廷中文艺复兴理想的杰出代表。这位贵族出身的诗人同时也是军人，曾参加远征希腊、突尼斯和法国的战争。韶华之年战死于沙场。他的诗集发表于身后，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卷牧歌。作

家将意大利自维吉尔、贺拉斯至桑纳扎罗一脉相承的田园风格与西班牙中世纪民歌传统熔于一炉，以充溢的诗情，浪漫的笔触讴歌牧人情侣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生活，同时也含蓄曲折地抒发了诗人情场落拓、田园山川的情怀，情调优雅和谐又略带几分惆怅。文字凝炼、平易，富于一种甜美的音乐感，成为后世田园小说和田园诗效法的楷模。

意大利诗派的崛起最初遭到传统派的抵制。然而它们二者之间的分歧是非本质的，只在于格律形式之争，而在精神上，传统诗派并不排斥外来的人文主义思潮。传统诗派的首领克里斯托瓦尔·德·卡斯蒂列霍（1490？—1550）是一位教士，曾多年宦游国外。他激烈地反对意大利诗派庄重滞缓的诗风，推崇节奏明快的传统八音节格律。其作品绝大部分便是用这样的诗体写成，风格、题材均酷似中世纪谣曲。然而这些诗作同时又具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和大胆批判现实的倾向，充满健康清新乐观的青春活力，因而同样被认为属于文艺复兴的行列。其中，《爱情的说教》和《妇女对话》机智幽默地讽刺揭露了宫廷和教会的荒淫糜烂。为此，宗教法庭出面干预，责令删去许多节。

十六世纪中叶，随着国内反宗教改革浊流的兴起以及文化专制的出现，知识界以往那种自由的空气不复存在。教会的正统思想占了统治地位，经院哲学复活，外来影响日趋减弱。于是基督教和柏拉图的思想渗透到几乎每一个诗人身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再能够轻易得到精神的宁静，因而纷纷采用不同的方式逃避现实。意大利诗派分裂为以萨拉曼卡和塞维亚两个城市命名的诗人集团，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观。前者尊崇贺拉斯，以简洁平易知名，后者则讲究形式多样化，文词绮丽，追求语言的音乐和色彩效果。

萨拉曼卡派的主要代表是教士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他作为萨拉曼卡

的教授，一生从事神学研究，曾因不肯俯就经院派的正统学说并且违背教会信纲翻译了《雅歌》，使之流传，而被判监禁五年。他的思想十分庞杂，倾向于将基督教传统同古希腊哲学及人文主义思想调和起来。这在当时西班牙知识界颇具典型性。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路易斯·德·莱昂向往古典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注重研究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原本，从中汲取某种批判精神，写下许多论述宗教问题的文章。后人尊他为散文之父。然而他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抒情诗。他的诗集共三卷，其中两卷是译作（包括维吉尔的《雅歌》、荷马的《奥德赛》、《圣经》中的《诗篇》等）。另一卷为创作集，计有诗二十余篇（如《隐居生活》、《宁静的夜》、《献给费利佩·鲁伊斯》等）。诗虽不多，却为他在诗坛赢得了崇高的地位。诗人一生坎坷，尖锐地体会到现实生活阴暗丑恶，充满伪善和不公正，热切期望到大自然或天国中觅寻心灵的安宁。这种含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思想情绪反映到了诗中，表现为不可遏止的感情狂澜。诗的文字经反复锤炼，显得比前代诗人更精炼、纯净、质朴，颇得荷马及古罗马诗人的神韵。

塞维亚派的代表诗人费尔南多·埃雷拉（1534—1597）是一位低级神职人员，性情孤僻，以做学问和吟诗为乐，是那种远离军旅和宫廷生活的知识分子典型。他仰慕加尔西拉索，但主张诗的语言不宜通俗，而应调动一切修辞手段加以丰富，使之高雅奇崛。这样他创造了一种与古典文风截然不同的诗风，打破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平衡，突出强调文采，为十七世纪巴罗克文学开了先河。在创作中，埃雷拉显示了驾驭文学的非凡才能。他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爱情题材的诗，悒郁感伤，多出现荒原废墟、孤寂阴冷的森林之类的意象。另一类是爱国主义题材的诗歌，颂扬查理五世的帝国，雄浑豪迈，气势磅礴。

西班牙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即“黄金时代”始于十六世纪中叶。它是伴随着小说和戏剧的繁荣一起到来的。

整个十六世纪上半期，西班牙的小说极不景气。业已在欧洲其它国家没落的骑士小说依然在西班牙文坛泛滥。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荒诞不经能供人消闲解闷，更因为它歌颂了冒险精神，迎合了当时西班牙帝国对外殖民扩张所造成的社会风尚。到了五十年代，由加尔西拉索引入西班牙诗坛的田园牧歌主题，以小说的形式发展起来，结果诞生了西班牙第一部典型的田园小说《迪亚娜》（1559？）。作品出自豪尔赫·德·蒙特马约尔（1520—1561）之手，描写了几位牧人之间的恋爱故事：西雷诺热恋着迪亚娜。但是当他长期外出归来后，发现旧日的情人已同另一牧人结婚。他痛苦万分。最后与其他许多失恋的痴情男女一道求助于女魔法师费莉西娅，得到仙水，治愈了内心创伤。小说问世后风行一时，被译成几国文学，同时模仿之作大量涌现。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和戏剧家洛贝·德·维加也曾创作过田园体的小说（《卡拉特阿》1585、《阿尔卡迪亚》1598）。田园小说是用理想主义的方法，徐缓的笔调，在虚构美化了的乡村环境中展开爱情的悲欢离合故事。这类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极不真实。但是它歌颂理想的幸福和爱情，同样包含人文主义的精神。

在小说领域真正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现实主义的崛起。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全面衰落，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不满、失望的情绪与日俱增。那些回避现实，靠虚构想象给人以慰藉的小说，显然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样一种以暴露社会现实为目的的小说——流浪汉小说便应运而生。流浪汉小说和田园小说、骑士小说不同，是西班牙首创的，对欧洲文学是一大贡献。所谓流浪汉小说是以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流浪汉为主角，用自述方法写成的小

说。因主人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阅尽人间世事，所以使小说获得很大的容量，能够展示出广阔的社会图景。

西班牙第一部流浪汉小说是佚名之作《小癞子》（又名《托尔梅斯河的小拉萨罗》）。作品初版已失传。现在留存下的最早版本系1554年问世。小说以自传形式讲述主人公拉萨罗半生的经历。他生于托尔梅斯河畔，自幼因家贫出走他乡，以各种方式谋生。最初给盲人乞丐领路，后又多次更换主人，充当了教士、落泊的骑士、兜售免罪符的人、神父、公差的佣人和帮手，终于挣扎到成家立业，勉强获得温饱。

和以往绝大多数小说不同，《小癞子》把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引进了文学的殿堂，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拉萨罗出身卑微，在生活中始终是个弱者。他原本不谙世事，天真无邪，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处处碰壁。最后为了求得生存，也学得油滑巧诈。这样小说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那个扼杀善良的人性，使人堕落的社会。

小说对教会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教士们悭吝、贪婪、伪善、荒淫的嘴脸。作者借拉萨罗之口痛斥了那些在袈裟掩护下干的卑鄙勾当。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那些鞭挞还是出自经过教会当局大肆删改过的所谓“洁本”，原作的锋芒可想而知。

《小癞子》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是用一种幽默的、近于玩世不恭的口吻叙述出来的。主人公不仅嘲弄那些社会丑类，而且有时也自我讥讽，对自己所受的苦报以微笑。它也许可算现代西方文学“黑色幽默”的鼻祖。这种机智的讽刺具有某种艺术感染力，使人读来妙趣横生。

《小癞子》问世获得极大成功，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它首创了写实主义的小说体裁，“为世界文坛提供了现代风俗小说的一个范

本”。继它之后，许多人都创作了类似题材的作品。比较成功的有马特奥·阿莱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1599）、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一比列加斯的《骗子外传》等。

流浪汉小说的兴盛仅仅是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而现实主义的主峰则是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塞万提斯。

西班牙的民族戏剧可以说始于十六世纪。在此之前只有少数略具戏剧雏形的宗教剧流传民间。它们大部分已失传了。生活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胡安·恩西纳（1469—1529）是民族戏剧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摆脱了宗教剧的影响，创作了有比较完整的剧情、动作和人物的世俗诗剧。其中较出色的是《克里斯蒂诺和费贝阿》、《普拉西达和维托里阿诺》、《菲莱诺、桑巴尔多和卡尔多尼奥》等。以后吉尔·维森特（1465—1537）、巴托洛梅·德·托雷斯、纳亚罗（1485—1520?）以及洛佩·德·鲁埃达（1505—1565）分别对民族戏剧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洛佩·德·鲁埃达。他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深受观众的喜爱。塞万提斯就曾热烈地赞扬过他。他受意大利戏剧影响创作了一些喜剧，但是更使之博得盛名的是他的大众化短剧。这些剧均用散文写成，现实主义倾向极为鲜明。内容多取自乡村或小镇中日常生活，人物则主要是呆汉、牧人、黑人、农夫、仆从等。剧情简单，主要以生动诙谐的对话和饶有趣味的生活小景取胜。

经过上述几位剧作家的努力，西班牙民族戏剧逐渐形成，但是要真正使之成熟起来，并能够与其它各国的戏剧比肩而立，尚需有一位天才去推动。这就是十六世纪末出现在西班牙文坛的洛贝·德·维加。

第二节 塞万提斯

文美惠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米盖

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于1547年诞生于新卡斯蒂亚省的古老文化城市阿尔卡拉·德·厄纳勒斯。他出生的确实月日已不可考，但从教堂登记簿上得知，他是在当年10月9日受洗礼的。

塞万提斯的父亲罗德里哥，是个医道不甚高明，又患耳聋病的外科医生。祖先属于绅士阶层，到罗德里哥这一代家道中落，成了靠行医谋生的穷人。罗德里哥经常往来于几个大城市，一家人也随着父亲迁徙，到过瓦雅多利德、哥多瓦、塞维利亚等城市。1566年，塞万提斯全家迁到新的首都马德里。米盖尔·塞万提斯在这里上了中学，1568年，曾从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胡安·洛佩斯·德·奥约斯学习文法和作文。米盖尔学习勤奋，他的几首哀悼西班牙王后逝世的十四行诗得到了奥约斯的称赞。

1569年12月，塞万提斯充当罗马教廷红衣主教胡利奥·阿恬维瓦的随从，去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

1570年6月，塞万提斯参加了西班牙驻意大利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并参加了1571年10月7日的著名雷邦德海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入侵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军舰队被西班牙、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的联合舰队打得大败，从而解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帝国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威胁。塞万提斯在这次战役中带病参加战斗，英勇杀敌，胸部和手臂受了枪伤，左手因而终生残废。但塞万提斯一点也不懊悔，他说，“我的手是在从古到今最伟大的战役里残废的”，他为自己负伤而感到自豪。

1575年9月，塞万提斯归国探亲，他乘坐的船只途中受到袭击，他被土耳其海盗掳到阿尔及尔。塞万提斯身边带了一封西班牙统帅堂胡安举荐他为军官的信件，被当作重要人物，海盗向他勒索巨额赎金。塞万提斯的父母早已一贫如洗，一时难以筹措，致使

他长期身陷囹圄。塞万提斯不甘忍受奴役，几次组织同伴逃走，表现十分勇敢，但几次逃跑都遭到失败。他被囚禁了五年，到1580年才被赎身回国。

塞万提斯回国后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救济和重用，不得不为生活奔波。最初他想靠创作谋生，于1585年出版田园小说《伽莱苔亚》（第一部），同时为剧院创作剧本，从1584年到1586年，他写了二三十个剧本，但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至今只保存了两个剧本，一部是《阿尔及尔风习》，描写了西班牙俘虏在阿尔及尔的生活。另一部是《奴曼西亚》，歌颂了古西班牙人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据。罗马军团入侵西班牙，大军包围了奴曼西亚城，全城人民浴血奋战，罗马侵略者围城十四年，始终无法征服奴曼西亚。最后全城人民弹尽粮绝，壮烈牺牲，给敌人留下的是座死城。这个剧本充溢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评论家们认为可以与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媲美。

1584年塞万提斯和一位名叫卡塔利娜·德·帕拉西奥斯的年轻姑娘结了婚。他这时还要养活两个姐姐、姐姐的女儿和他早年和另一位女生下的私生女。创作的报酬十分菲薄，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塞万提斯在1587年找了一份军队征粮员的差使，后来又当了地方上的收税员。这两个差使他先后一共干了十五年。他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要在各地奔走，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了社会上种种黑暗现象。富于正义感的塞万提斯从不徇私纳贿，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但他却因征收教会的麦子而得罪了当地主教，曾经被宣布开除教籍。塞万提斯的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后来创作《堂吉诃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605年1月，塞万提斯的不朽名著《堂吉诃德》上卷在马德里出版。这部小说大约在1602年前后开始创作。塞万提斯在担任征粮

员和收税员时，曾数次被诬以“擅自征粮”、“账目不清”、“亏欠公款”的罪名而短期入狱，据说他就是有一次在牢狱里开始构思《堂吉诃德》的。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轰动了全国，当年就再版六次之多。但是塞万提斯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只是给出版商赚了一大笔钱。这段时期，塞万提斯全家住在一条穷人居住的街道上，他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他写书出了名而有所提高。1605年6月，一个放荡的宫廷贵族在塞万提斯家门外遇刺身亡，当局不敢抓捕真正的凶手，却拘留了塞万提斯一家，虽说他们不久便被释放，但名誉却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从1602年到1616年是塞万提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在这些年里，塞万提斯的家庭遭到许多变故，父母先后在贫病中死去。1600年哥哥死去，1609年守寡的姐姐也因病故去。塞万提斯身处逆境，意志弥坚，他忍受了丧失亲人的痛苦和社会上诬谄歧视带给他的烦恼，伏案奋笔疾书，通过一部部作品，揭露了社会的丑恶，歌颂了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1613年，出版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1614年，出版了长诗《巴尔纳斯游记》。1615年，《从未上演过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出版。

塞万提斯的作品的批判锋芒，刺痛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1614年，正当塞万提斯继续创作《堂吉诃德》第二部时，一个化名阿维亚纳达的人出版了一部伪《堂吉诃德》续集，书中对塞万提斯进行了恶意的人身攻击，并且肆意歪曲和丑化小说主人公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形象。这种恶毒的诬蔑使塞万提斯非常气愤，他加紧写作，于161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下卷。这部作品比上卷更加成熟。它的出版，使伪作相形见绌，从此伪作销声匿迹，无人问津。

1616年，塞万提斯患了重病，他自知已无法痊愈，不但没有流露悲观的情绪，而且加紧写作，完成了歌颂骑士理想的小说《贝

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6年4月23日，距他写完小说的前言仅仅几天，塞万提斯病重不治，就在他简陋的寓所里与世长辞了。这位伟大作家生于忧患，死于贫困，故世后被埋在一家修道院的墓地里，墓上也没有树立碑石，1635年修道院拆迁，墓地的全部尸骨被掘出火化，葬在一起。塞万提斯这个为世界上亿万读者景仰的伟大作家的骨灰，就这样和他热爱的普通西班牙人民的骨灰混在一起了。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前言里说，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社会上风行一时的骑士小说，因为这类小说脱离现实，荒唐可笑。《堂吉诃德》就是用模仿骑士小说的方法，来“以毒攻毒”的。

小说全名是《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拉·曼却地方的一位老乡下绅士。他闲着无事，成天沉溺于骑士小说中，以致神智昏迷，决心学古代骑士的样子，出门去行侠仗义。他找出祖传的一副破盔甲，骑上家里的一匹驽马，找了个农民桑丘·潘沙做骑士侍从，便出发去实现骑士的理想了。

堂吉诃德先后三次出门，有许多次奇遇。他来到一家小客店，幻想这是一座封建城堡，把客店老板看作城堡长官，硬要他封自己为“骑士”，老板以为他是疯子，只好依从他，好把他打发走。他在路上碰见一个正在毒打放羊孩子的地主，他立刻上前阻拦，命令地主把积欠的工资付给放羊孩子，地主满口答应。但是堂吉诃德刚刚离开，地主就给了放羊孩子更厉害的毒打。堂吉诃德把耸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座风车看成是长臂巨人，把牧童驱赶的羊群当作是一支支的军队，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厮杀，结果总是被摔得头晕眼花，被打得头破血流。另一次，他释放了一群被押去服苦役的犯人，却被犯人们打倒在地，抢去了他的衣服。

堂吉诃德虽然到处碰壁，仍不悔悟，以为他的失败，都是由于魔法师和他作对。他每吃一次苦头，总是不等伤口痊愈，就又兴致勃勃地骑上了马，继续进行骑士冒险活动。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是个穷苦农民，他跟随主人出外冒险，是因为日子难过，想从“侍从”这个差使中得点实际的好处。他念念不忘主人答应赏赐给他的“海岛”。堂吉诃德和桑丘有一次遇见一对闲得无聊的公爵夫人，想拿这对主仆寻开心，把他们请到自己府邸，设下许多圈套来捉弄他们。公爵假意封桑丘为他领地上一个“海岛”的总督，存心要看这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佬的笑话。哪知桑丘做了“总督”以后审起案子来非常英明，还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显示了劳动者的朴素智慧，反而让嘲弄人的公爵夫妇出了丑。

堂吉诃德的亲人为了让他回家，派大学生加拉斯果也化装成骑士，去向他挑战，和他比武。加拉斯果打败了堂吉诃德，命令他回家去，一年之内不许出门游侠。堂吉诃德没有实现自己的骑士业绩，心情郁闷地回了家，不久就病倒了。临终的时候他神智清醒过来，大骂骑士小说害人不浅，他立下遗嘱，不许外甥女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剥夺她的继承权。立下遗嘱以后，堂吉诃德便与世长辞了。

《堂吉诃德》不仅是欧洲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既有强烈思想倾向又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伟大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展现了一幅五光十色、包罗万象的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封建社会的广阔生活图景，表现了正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种种复杂的宗教、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矛盾。作者对于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对于社会上的暴力、奴役，表现了强烈的憎恨，在揭露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人民的苦难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了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的积极乐观态度。革命导

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堂吉诃德》都作了极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位“超群的小说家”，恩格斯则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位“强烈的倾向诗人”，与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相比也毫不逊色。

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已经成了世界闻名的文学典型。这个典型内涵十分丰富，一方面，堂吉诃德是一个有崇高品德和为正义事业献身的“骑士”，也是一个学识渊博、有文化教养、热心善良、幽默可亲的长者。他坚持正义，嫉恶如仇，为了世人不惜牺牲自己。他为了实现维护真理和正义的理想，出门游侠，百折不回，这种救世济人的宏大胸怀不能不博得人们的赞赏和钦佩。而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又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不自量力，要“行侠仗义”，结果事与愿违，总是以失败告终。正象鲁迅先生指出的，堂吉诃德“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错误是在他的打法”。正因为他脱离实际，主观蛮干，把幻想当作现实，又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常常看错对象，打错敌人，不但自己大吃苦头，连他想“拯救”的人也跟着遭殃。作者采用了滑稽诙谐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一连串极其夸张的喜剧性情节，便突出了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性格特征，塑造出了这个丰富而复杂的典型形象。

塞万提斯是从文学反映现实真实的原则出发来塑造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反对奴役，要求个性解放和要求自由平等的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但是由于西班牙人文主义运动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以及作者自身的局限，使得塞万提斯找不到改革社会的途径，于是只得以谐谑逗趣的方式，倒退到古代，搬出过时的骑士理想，让堂吉诃德以游侠骑士单枪匹马打天下的办法来体现自己改革现状的臆想。因此，堂吉诃德的游侠的必然结

局是失败，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他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堂吉诃德虽说是个喜剧性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身上反映的改革社会的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使这个人物又带上了悲剧的色彩。德国著名诗人读到堂吉诃德这位品德高尚的骑士受到侮辱和毒打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也认为《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高度赞扬了《堂吉诃德》的成就：

“在所有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与庸俗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还塑造了另一个使人难忘的典型，那就是骑士的侍从桑丘·潘沙。他和堂吉诃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互相补充，相映成趣：堂吉诃德重幻想，敢打敢冲，桑丘重实际，胆小怕事。堂吉诃德出门是为了建立骑士功勋，桑丘出门却是为了得到主人赏赐的“海岛”。在小说第二部中，桑丘性格中幽默、正直、智慧等劳动人民的正面品质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当桑丘果真当上“海岛”总督时，他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成了一个贤明公正、廉洁清白的“父母官”，果真给当地人办了几件好事，才被公爵手下的人把他轰下台。在桑丘这个令人喜爱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农民身上，体现了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精神。

《堂吉诃德》在欧洲文学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后世的作家受它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里出现了不少“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象菲尔丁笔下的亚当斯牧师，斯特恩笔下的托贝叔叔，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米什金公爵，罗斯丹笔

下的西哈诺等等。而其他一些作家如司各特、巴尔扎克、果戈理、萨尔蒂柯夫—谢林、列夫·托尔斯泰等也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这部作品的影响。

塞万提斯其他的重要作品还有《惩恶扬善故事集》和《从未上演过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

《惩恶扬善故事集》包括十二篇故事，内容有两类，一类模仿当时意大利的短篇小说形式。它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为题材，描写了动人的爱情故事和曲折离奇的冒险经历。属于这一类的有八个故事《吉卜赛小姑娘》、《英国的西班牙姑娘》、《大名鼎鼎的洗碗姑娘》、《慷慨的情人》、《两个少女》、《血的力量》、《骗婚》、《科内妮亚夫人》。

这些小说情节离奇，结构完美，语言细腻优美，富有抒情色彩。它们反映了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无私的友谊，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和幸福的美好理想。不过小说未能摆脱言情小说的俗套，明明是一对情人勇敢地挣脱社会地位、宗教、民族等障碍，追求到了幸福，作者总要好心地让处于卑贱地位的女主人公父女重逢，得到财产和贵族身分，使大团圆带上了庸俗的富贵气。

《惩恶扬善故事集》里另一类小说都是带有哲理性的作品，偏重于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揭露，主要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写法。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有《狗的对话》、《里柯内特和柯塔蒂略》、《玻璃硕士》、《忌妒的义斯德勒马都拉人》等。《狗的对话》通过两只会说话的狗讲述他们所见所闻，揭露了社会上的虚伪和欺诈行为。《玻璃硕士》描写一个自以为是玻璃做成的疯大学生的言论，用充满哲理的妙语箴言表达了他对社会上各种人物和现象的看法，其讽刺的锋芒指向封建社会的丑陋和堕落。《里柯内特和柯塔蒂略》揭发了下层社会的黑幕和犯罪行为。这些作品有讽刺，有谴责，阐述了作者的哲理见解，充满